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 40 年

王子今¹

(1.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7;

2.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秦汉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实现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前张骞时代, 中原与外域已经有文化联系。而汉武帝时代张骞“凿空”, 草原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均得以畅通, 西南丝绸之路也得以发挥文化联系的效能。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 全面介入社会意识, 影响了历史文化走向。40 年来,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步入新的学术境界,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体现出突出的学术进步。

【关键词】: 丝绸之路 佛教 西域 南洋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6-0085-13

秦汉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实现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周穆王西行传说和西王母神话, 以及考古工作收获所证明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 体现早在前张骞时代, 中原与外域已经有文化联系, 并明显影响了生产与生活方式。汉武帝时代张骞“凿空”, 草原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均得以开通, 西南丝绸之路线路也得以发挥文化联系的效能。中外关系史的新境界, 司马迁言汉武帝时代“通西国, 靡北胡”。又说:“汉既通使大夏, 而西极远蛮, 引领内乡, 欲观中国。”¹秦汉时期中外交往的密切, 是这一时段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特别醒目的现象。而在中外关系通史中, 秦汉阶段的历史表现也有非常精彩的时代个性。

总体说来,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 40 年来已经成为研究关注的学术方向, 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超越此前的进步。对于“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 40 年”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是必要的。由于笔者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的限定以及若干具体困难, 本文的工作成效可能与设计者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不过, 或许简略的、粗线条的相关总结, 对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回顾也有些裨益。

一、“秦汉史”断代研究学术专著对中外关系史的关注

“秦汉史”断代研究专著, 大多重视中外关系的考察和说明。以往秦汉史断代研究专著多重视中外关系史。我们可以列举若干初版超逾了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 但近 40 年依然再版的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二章第六节“西汉疆域和文化影响的扩展”, 第三章的五节“汉文化对周邻各族的影响”, 内容都涉及中外关系。^②瞿兑之《秦汉史纂》论“武帝开边”, 说到“朝鲜”“西域”, 关于王莽“新政”, 说到“边疆骚动”, 关于东汉“兵事”, 也说到“西域”。对于“远使大秦, 几通欧亚”亦有所论说。^①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至第七节分别为“武帝事四夷一”“武帝事四夷二”“武帝事四夷三”“武帝事四夷四”“武帝事四夷五”, 所论东至“朝鲜”, 西至“身毒”。第九章第三节“后汉定西域”, 第四节“汉与

¹作者简介: 王子今,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秦汉史、中外交通史。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

西南洋交通”，以及第二十章第七节“佛教东来”，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外关系史。⁽²⁾

40 年来的秦汉史论著更为重视中外关系史的论述。《秦帝国史》专设“对外关系的发展”一章，论说“同亚洲各国的关系”（朝鲜，日本）和“同中亚各地的关系”。⁽³⁾林剑鸣《秦汉史》除了讨论“西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以及东汉“汉、匈在西域的争夺”之外，专有“中外文明的碰撞”一节，指出：“秦汉时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规模的，向外传播是远距离的，从而构成了与秦以前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⁴⁾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三章第二节“汉朝与边境各族的关系，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第五章第三节“东汉与匈奴、西域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两汉中外关系。⁽⁵⁾较早写作，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后来又经整理校订，于 1983 年得以面世的翦伯赞《秦汉史》，在西汉史的论述中介绍了“西汉时期世界的新形势”“西汉与中亚商路的开通”“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有关东汉史的论说中，又指出有关“商业、都市、钱币与国际贸易的再展开”的历史事实。对于“佛教的最初传入”也有所说明。在有关中外关系的分析中，作者写到：汉武帝时代以后，“中国史再不是一些碎片的自由运动，而是在一个历史动力的运转之下，展开了全面的发展与统一的运动了”。翦伯赞指出：“大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一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太阳系中的一颗流星，这颗流星，降落在中亚，象陨石一样，落在妫水流域。然而它在妫水流域，却大放光明。匈奴人把大月氏抛掷到中亚，大月氏人又把希腊人抛掷到印度，到费尔干，希腊人又再降落在印度文化中，降落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同时大月氏又把阿萨克斯人逼向西走，于是而罗马人又不幸地领略阿萨克斯人的响箭。”他又说：“北匈奴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二次抛掷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就是中国这个太阳系中第二颗流星。这颗流星后来降落在欧罗巴的原野，成为四世纪西欧历史的动力。”中国远征军直接进入中亚，也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事件。“至于武、昭、宣时代，中国军队在中亚之出现，那已经不是流星，而是太阳光芒的照射。当此之时，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央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采，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景，这就是东西两个世界的历史运动之交流，亦即世界历史的运动走向统一的表征。”⁽⁶⁾韩复智等编著《秦汉史》第十一章明确以“秦汉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为题，分为“第一节，朝鲜与日本”，“第二节，印度、中亚与以西诸国”。所谓“中亚与以西诸国”，包括：（一）康居，（二）大月氏、罽宾，（三）安息、条支，（四）大秦。⁽⁷⁾也论及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历史迹象。

劳干《秦汉史》虽然没有明确涉及中外关系的章目，但是对于相关历史有专门的论说。例如汉明帝时代的西域经营以及“佛教的输入”。⁽⁸⁾也对中外关系史予以关注。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一文，比较分析了 50 年来 12 种以《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分别指出了其成败优劣。对于总体学术形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点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的大体概括。作者希望，21 世纪的新的《秦汉史》，“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⁹⁾上述以《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有关中外关系的论说，大致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对秦史的论述以考古资料和文物资料为实证，多有精辟论断。其中也涉及中外关系。如关于“秦青铜器”的分析，作者指出，有的器物“形制非常特异”，“和常见的中国青铜器有别，有学者以之与中亚的一些器物相比。”⁽²⁾它是否模仿中亚的风格，很值得探讨”。对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即“人们所熟知的‘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李学勤指出，“这个时代可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希腊媲美，在科学、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杰出的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秦的统一，李学勤认为，“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³⁾这样的视角，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二、秦汉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

秦汉中外关系相关制度史的研究，以往未受到充分重视。黎虎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空白。季羨林在

推荐书中写道：“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者，则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们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于是《汉唐外交制度史》被称作“一部有开创意义的著作”。⁽⁴⁾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则专论汉代，有关“外交通工具”与“外交文书”“外交接待设施”，以及“外交礼仪与法纪”的说明，分别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说。⁽⁵⁾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涉及汉代有关中外文化交流至为重要的边地管理体制的特征与边地行政官员的表现，主要内容也可以视为制度史研究。对于相关问题，作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所论颇多新见。⁽⁶⁾赵梅春《王符的治边思想》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边地控制、边民治理的政策，其实也涉及边地民族关系与外交策略。⁽⁷⁾曹旭东《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问题》⁽⁸⁾也讨论了这一主题。李炳泉《两汉农都尉的设置数额及其隶属关系》，探讨了边郡主持屯田事务的长官设置时间、地点和行政归属关系。⁽⁹⁾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¹⁰⁾

边地经济开发受到较多关注。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¹¹⁾汪受宽《秦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¹²⁾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指出，汉代北部边郡突出战略防御，在经济开发方面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投资规模大，短期效益明显，但持续性不强。西南边郡重在治理，投资规模小，发展缓慢，但是稳定持久。⁽¹³⁾此论题还可以参考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和《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农业开发》。⁽¹⁴⁾

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注重从物质文明层次考察汉代外来文化影响。首先分论“动物篇”“植物篇”“器物篇”“毛皮与纺织品”“香料、医药与医术”“珠宝篇”“人工饰珠”等。其实“医药和医术”是包括精神文明层次的内容的。而此后的篇幅则论“佛教的初传”“艺术篇”“诗赋中的外来文化因子”，则都以精神文明层次的外来因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¹⁾全书视角广阔，覆盖面宽。对于所涉及的对象，有些论述颇有深度。然而对于“各类造型艺术”的分析，没有提供图像信息，不免令人遗憾。

对于西北草原通道，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列“汉代和西域的交通”一章，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分别讨论“两汉时代的西域”“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两汉和西域各国的经济往来”“两汉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佛教的传入”等问题。由于“中西”的主题限定，没有讨论其他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²⁾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考证了“蛮夷邸”的设置管理制度以及在北京中的方位、居住番客的成分等，从一个特殊视角观察了汉王朝外交制度的有关设定。⁽³⁾周永卫《蜀商·汉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则试图通过丝绸之路不同身份特殊人群的活跃表现，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时代阶段划分。⁽⁴⁾其实，“商胡”“贾胡”的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⁵⁾

《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提到“秦始皇对海洋的兴趣”以及徐市“出航”事迹，也总结了秦汉时期“南海和印度洋”成为“中外贸易繁忙的通道”的作用。论者还写道：“罗马商人秦论是我国文献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欧洲人，孙权本来想通过他与罗马直接建立友好关系，可惜的是孙权的使者刘咸半道死亡，没有完成出使的使命。其‘男女各十人’则似乎给秦论带到了欧洲，这或者是中国人有数可稽的通过海道前往欧洲的第一批居民。”除了燕齐海上方士“具有海洋知识”而外，“季风的发现和季风航海的开始”“潮流、潮汐知识”“在航海中的应用”，也都成为中外文化通过海路交流的技术条件。⁽⁶⁾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成果中，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⁷⁾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⁸⁾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⁹⁾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¹⁰⁾张安福《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究》，⁽¹¹⁾张合荣《夜郎寻踪——战国秦汉时期的贵州》，⁽¹²⁾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¹³⁾谢崇安《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¹⁴⁾周永卫等《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¹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¹⁶⁾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¹⁷⁾等，都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丝绸之路史研究：西域方向

西汉帝国对于“北边”战略予以特别的重视。自霍去病控制河西之后，汉武帝及时设立四郡，保障了与西域交通的便利。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终于退却。汉文化的扩张，影响了西域社会面貌。⁽¹⁸⁾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西域”取广义，即指今天被称为中亚的地区，其中有关两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内容，⁽¹⁾对于深入认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应当是有益的。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有较宽的考察视角，也体现出较深入的考察深度。⁽²⁾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³⁾张志坤《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辨正》，⁽⁴⁾涉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学术主题。郝树声《浅论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对汉王朝军队远征历史意义的分析，提示了丝绸之路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⁵⁾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的考察兼及汉武帝决策对于匈奴和大宛的战略考虑。李虎《班彪述评》则论说了班彪主持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军事与外交行为。⁽⁶⁾孟祥才《论班彪》高度赞扬了班彪经营西域的功业。⁽⁷⁾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考察了班彪在西域军事外交表现中体现的民族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⁸⁾

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论证了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条件之一。⁽⁹⁾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¹⁰⁾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¹¹⁾侯甬坚《西汉政府的西北边疆开发中的投入》，⁽¹²⁾何诗海《汉代屯田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¹³⁾也论说大致同样的主题。李清凌的讨论涉及“气象”，体现出新的视角的历史观察。

对于西域民族史和西域地方史，徐志斌《略论若羌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有所讨论。⁽¹⁴⁾有关龟兹史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¹⁵⁾对于其他绿洲地域及其与中原关系的研究也有值得重视的成果。⁽¹⁶⁾防范“胡”“羌”联合形成的威胁，是丝绸之路沿线军事防卫的主要考虑。周松《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论说了这种威胁的发生。⁽¹⁷⁾汉王朝首先要求“隔绝羌胡”，同时，也致力于“通货羌胡”，⁽¹⁸⁾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阐述了“羌祸”对东汉一朝经营西域的深远影响，揭示了西域与河、湟、陇的战略一体关系。⁽¹⁹⁾相关成果还有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²⁰⁾等。

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对学界久有歧见的戊己校尉问题利用汉简材料进行辨析，认为戊、己校尉是二官，不是一官；戊、己校尉均驻车师，隶属于中央北军，而非敦煌郡。⁽²¹⁾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也讨论了相关问题。⁽²²⁾有的学者以为这一学术问题属于“历史地理研究”，⁽²³⁾其实也可以看作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成果。有的学者认为，两汉西北方向边关屯戍机构及屯戍基地，反映了汉代相关制度的高度完善，然而也给两汉以后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¹⁾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考察了官职设定与汉王朝西域经营方式的关系。⁽²⁾

对于西域“和亲”，刘萧元《试论解忧》有所考论。⁽³⁾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姚景洲《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⁴⁾葛亮《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认为，昭君出塞“和亲”说是唐代人的联想，汉代的史籍无此一说。“和亲”一词，在汉代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捐弃前嫌、消弭战争、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在唐代指政治联姻。作者呼吁摒弃昭君“和亲”说，还历史以真实。⁽⁵⁾黎虎的系列论文《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质侍”——汉代交聘方式之一》《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等。⁽⁶⁾对于“和亲”“交聘”进行了综合讨论。考察王昭君事迹对于文化交流之作用的研究成果，还有王绍东《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文明与野蛮”之辨——从昭君形象的悲剧化色彩说起》，⁽⁷⁾王子今《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⁸⁾等。有关王昭君形象之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专著，可参考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⁹⁾

廖伯源《使者与官职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在对“使者”身份的全面考察中，涉及文化交流史。⁽¹⁰⁾有关长罗侯常惠在西域的活动，多有学者予以考察。⁽¹¹⁾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则是对郑吉事迹的专门研究。⁽¹²⁾陈金生《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述了“质子”身份的作用。⁽¹³⁾多种社会活动形式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都受到学界重视。

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认为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维系着草原民族

和农耕民族的交往。^[14]这一方向的民族关系，是与西北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相关的。因为许多迹象表明，匈奴积极参与了草原民族之间的丝绸贸易。^[15]郝树声《汉初的河西匈奴》一文直接考察了匈奴在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初期的历史作用。^[16]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一文认为，在西汉一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构成以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为“极”的两极格局。^[17]这样的认识也值得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参考。

对于西域方向丝绸之路交通线路的考论，有马千希《汉代“五船道”考略》等发表。马文对《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说到的丝绸之路所谓“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1]的重要路段进行了考察，根据对多种古地图的分析，认为从敦煌至伊吾间三条古道之一的西道即汉代的古船道。具体路线为玉门关—横坛—三垅沙—龙堆。^[2]利用文物资料研究西域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有学者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研究》结合悬泉置汉简资料，讨论了渠犁屯田问题，认为其性质为军屯，是西汉自汉武帝时代至汉宣帝时代在西域屯田的一次成功尝试。^[3]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也取同样的学术路径进行了与西域史相关的考论，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汉朝的曲折关系》分析了汉王朝与康居关系史的变化。^[5]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运用新出土文献发表了有关汉王朝与楼兰(鄯善)关系的新认识。^[6]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据汉简资料提供的信息考论汉与乌孙关系史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提出了新见。^[7]马智全《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则借助汉简资料论述了汉王朝与车师的关系。^[8]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专列两章“西域与中外关系(上)”“西域与中外关系(下)”，讨论了“罗马战俘”问题，“敦煌早期佛教的传播”问题，“两汉西域屯田”问题，以及汉与康居的关系，汉与乌孙的关系等，是通过汉简资料考察中外关系史的高质量的论著。^[9]有评论说，这部专著对于“中西交通、西北地方的民族关系以及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10]郭文玲《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利用额济纳汉简进行的考察订正了《汉书》记载的讹误。^[11]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认为悬泉汉简中的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是对该国别名或首都的译称；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 Sisyges。^[12]张俊民根据悬泉置出土发表“东西交通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悬泉汉简所见‘骑置’”“西汉敦煌郡县制名称”“悬泉汉简所见舍舍及舍舍制度”“悬泉汉简马匹问题”“悬泉汉简所见邮驿制度”等学术成果，《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一书出版。其中多有学术新知。^[13]

李卫星《论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发掘了汉代图象资料，指出汉帝国与西域诸国时战时和的性质，西来稀有物种与杂技艺术的传入，以及佛教东渐等历史现象，都可以在汉画中发现证据。^[14]李智君《汉晋河西地缘经济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考察了河西地缘政治与佛教文化向内地传播路径的关系，认为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对于家族佛教和王室佛教的影响力，抗衡区域政治势力。这样的复杂关系，影响了佛教通过这一路径对内地的影响。^[15]相近学术主题的考察，还应当注意孙少华《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16]等成果。有学者认为，汉代社会有关“西王母”崇拜的民间表现，也与西域通路的文化交流有关。^[17]秦汉人对于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以及当时对于外族文化的心理倾向，也有论著有所讨论。^[1]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以为“不得”为佛陀音译，可以说明佛教在当时社会已得普及。^[2]辛德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则认为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有特殊缘由，涉及天文占验观念伴随战国至秦代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3]胡文辉《〈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问题再议》指出：“在近九十年前，日本藤田丰八首先将‘禁不得祠’四字单独标举出来，认为‘不得’是梵文‘浮屠’(Buddha)的对音，也就是将‘不得祠’理解为佛教拜祭，证明佛教在秦始皇时代即已流传中国了”，“中国学者如马非百、岑仲勉皆信从之。”论者以为藤田之说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也就辛德勇说提出驳议，以为“禁不得祠”“应是特别针对那些被流放到边疆的罪人而言的，意思是禁止他们进行或参与祭祀活动”。^[4]这样的理解也涉及移居边地可能接触外域文化影响的“徙谪，实之初县”者们的生活境况和信仰等级，也间接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

四、丝绸之路史研究：南海方向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述了西汉时期得以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

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地区与汉王朝间海上商运相当繁忙：“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赏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王莽专政时，还曾经利用南洋航运进行政治宣传：“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由黄支国还可以继续前行：“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⁶⁾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国家或部族的具体位置，学者多有异议，而对于黄支国即印度康契普腊姆，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亦今斯里兰卡，中外学者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相当艰难，然而仍大致保持着畅通，海路于是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佛教题材摩崖造像，其中又多有“胡人”形象，⁽⁶⁾结合徐州东海地区佛教首先炽盛的记载，⁽⁷⁾则可以理解海上交通的历史文化作用。程存洁《东汉末年岭南佛教史迹小考》指出，可以将三国两晋时期岭南才有佛教流传这一传统看法提前至东汉末年。⁽⁸⁾

论述秦汉时期域外交通的研究成果中，吴廷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特别值得注意。作者认为，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早于陆路，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楚王刘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淮。而说明佛教由陆路从西域传来的可信史料相当晚。⁽¹⁾张荣芳著《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收入秦汉史研究论文 12 篇，其中研究重心之一就是南越社会文化研究。而《论马援征交阯的历史作用》《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等，都是直接涉及中外关系史的论文。⁽²⁾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讨论了徐闻作为南海重要港口对于中外关系史的重要作用。⁽³⁾这一学术方向的研究，后续成果很多。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刘秀确定的以“柔道”治天下，即“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表现为向北没有“扩张”的意识和能力，与西汉有明显差异。⁽⁴⁾然而马援征伐交阯、九真，因调动楼船军，对于南海航运有直接的促进意义。傅纯英《评马援南征》说，马援的军事行动得到岭南和交阯人民的支持，有保护中原与南洋、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⁵⁾祝总斌《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⁶⁾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⁷⁾等有所论说。王子今《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对于“琅玕”海港名号移用至南洋航道其他地方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⁸⁾对于秦汉时期不同阶段南洋航路的历史变化，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有自己的说明。其说大致合理。⁽⁹⁾

五、丝绸之路史研究：西南夷方向

杨共乐在《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文中说，罗马商人曾于公元 100 年至 101 年间到过中国。⁽¹⁰⁾研究者将这一成果列入“社会史研究”类别⁽¹¹⁾，这是因为这一“交往”实践对“社会史”形成了影响。对于西亚乃至更远地方居民来华路径比较明确的认证，我们可以考知“海西幻人”曾经经由缅甸、云南、四川抵达洛阳。⁽¹²⁾

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得到学界关注。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¹³⁾高大伦《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¹⁴⁾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¹⁵⁾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¹⁶⁾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¹⁷⁾，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¹⁸⁾等论著，分别讨论了以往学界关注不多的作为国际通道的西南地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风貌。这些研究成果，都涉及所研究的地区与外域以及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关系。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不赞同“川滇缅印道”之说，以为“言牂柯道与蜀交阯道更为符合历史实际”。⁽¹⁹⁾

徐青莲《汉代蜀布之形制与交通路线——汉代布帛研究举例》说到司马迁“蜀布”联想与西南方向外交路径的开拓。⁽²⁰⁾汉武帝推进的“西夷西”线路的探寻，表露了西南丝绸之路正是开拓的历史迹象。⁽¹⁾陈征平《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商品经济与货币形态发展》对这一时期云南地区商业经济形成的条件以及货币形态及流通领域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²⁾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³⁾提示我们注意“蜀商”在西南方向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作用。杨勇《可乐文化因素在

中南半岛的发现及初步认识⁽⁴⁾也对说明这一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石硕讨论《汉代西南夷中“僑”之族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指出复杂的民族迁徙史与民族融合史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⁵⁾这一主题的学术成果又比较集中地见于伍加仑、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⁶⁾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⁷⁾和蓝勇《南方丝绸之路》⁽⁸⁾都是以实地考察为研究基础的学术力作。

周永卫《匈奴与南越关系考》指出，在汉武帝前期，从河西经过今天的川西一带到西南夷地区，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利用这一通道，南越国与匈奴之间存在着虽然间接然而颇为密切的联系。⁽⁹⁾这说明河西—蜀地—西南夷地方有交通道路的历史事实，可以通过川西北至青海的考察有所发现。研究者相关认识的发表，见于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王子今《说敦煌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稷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考察》《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等。⁽¹⁰⁾

有斯里兰卡学者指出：“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斯里兰卡古书 Sihalawaththupparanaya 中记载，约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的十余位僧人乘船到达南印度，然后北上汇合印度僧人，一同游历至中国。这进一步证实了早在汉代中斯之间就有了来往。”⁽¹¹⁾然而，所谓可能“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古书”，当然不可能记述“约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僧人和印度僧人“游历至中国”事。但是这种“游历”在汉代确实是可能成功抵达中国的。其“游历”路径，可能与“海西幻人”相同。对于先秦至汉晋蜀身毒道、永昌道即红河水道，以及进桑糜冷道交通形势，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有认真的考论。⁽¹²⁾

六、丝绸之路史研究：东海方向

关于徐福东渡问题，近年来成为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讨论的热点。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一文认为，“严格地讲，有关徐福研究应分别属于‘历史的’和‘传说的’两个范畴，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主要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有关事件的原委，而不能夸大方士徐福的个人作用；后者需要分析这一传说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不能作为信史对待”。论者所指出的有关徐福的许多传说很难从考古学上予以论证的意见，值得学界重视。⁽¹³⁾

王颀《徐福东渡新考》一文认为，关于方士们追索的所谓“三神山”，其原型是自北极大洋南漂的冰山；徐福东渡，计有前后两次，一次自今舟山群岛往九州岛，一次自今渤海湾往本州岛；前一次航行所遇“海中大神”，当是当地的部族领袖。⁽¹⁾赵越云等《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业移民对日本列岛的影响》认为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优势充分彰显，对日本列岛形成了积极的影响。⁽²⁾

中原往朝鲜的移民，汉帝国征伐朝鲜的军事行为，都促进了这一方向的文化交流。⁽³⁾东海方向的海洋开发有较好的早期基础。⁽⁴⁾在秦汉时期的突出进步引人注目。⁽⁵⁾东海航运技术有可能对南洋航路的开通有积极的影响。⁽⁶⁾东海航运便利了秦汉帝国在东北亚的文化扩张，不经行海路的陆上文化交流，也有历史性的进步。东北亚方向对外文化交流的考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⁷⁾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⁸⁾王海《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⁹⁾孙德华、姜维公《秦汉魏晋时期吉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简论——以经济基础为观察视角》⁽¹⁰⁾，苏卫国、张旗《有关东汉辽东属国问题的一些看法》，⁽¹¹⁾赵红梅《“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考述》，⁽¹²⁾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¹³⁾程尼娜《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及其朝贡活动研究》《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¹⁴⁾李路等《汉代东北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探讨》，⁽¹⁵⁾王子今《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¹⁶⁾等研究成果。对于东海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秦始皇巡海”“汉武帝巡海”联系起来，注意到当时社会对海洋的特殊关注。⁽¹⁷⁾

七、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路径的更新

历史时期若干文化进程之动向的比较，是相当先进的研究方式。说到比较研究，应当提到梁作霖著《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

衰亡史》一书。如刘家和在该书《序》中所说，这一部书作为“对中外古史作系统比较研究之作”，“在国内尚无先例”。不过，虽然“其中新意甚多”，但还可以再作充实与完善的努力。《序》作者希望“有好学深思之士，读梁先生此书而能得其意，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领域有新拓展。”⁽¹⁸⁾

中日合作项目的成果，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一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通过对古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的考察，通过“量化和测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临淄周一汉代人的体质特点与现代和古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接近”。“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又证实，西日本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一汉代人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他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据此推测，他们在东亚大陆应该有最直接的共同或至少非常相近的祖源关系。”作者认为，西部日本渡来弥生人的故乡应该主要在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他们最近的祖先可能来自早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地理上更近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山东半岛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地区范围可能扩展到近海的江淮地区。”作者推测，导致他们迁动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多种因素，在迁动的时间上也可能是多层次的。而渡海迁徙活动大概主要发生在“大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相应”的时代。可能正是在这一大变动时期，“促使一些人口四向避乱，或寻求安定生活空间，其中的一些人则渡海到达邻近的海岛世界，同时也把他们最重要的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习俗带到了该地区”。⁽¹⁾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秦汉外交史的研究受到重视。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指出，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先秦外交使节主要是“辩士”，汉代外交使节主要是“勇士”。而这种变化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外交已经突破了先秦时代的“东亚外交圈”。黎虎《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也介绍了汉代外交人才发现及其合理组合的认真考虑。⁽²⁾这样的研究路径，也是有创新意义的。

对于汉武帝时代积极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有学者指出戾太子刘据以“私问《穀梁》而善之”为思想基点予以反对，揭示了《公羊传》和《穀梁传》政治思想的不同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以新的视角考察了中外关系史的政策层面。⁽³⁾

索德浩、刘雨茂《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 M23 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⁴⁾就一件文物进行考论。其意义在于通过形象资料揭示了丝绸之路史的一种重要现象。

八、考古学对秦汉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推进

关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于西耳室的原支象牙，《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的鉴定》一文指出：“出土标本的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现生非洲象较为接近，而与现生亚洲象区别较明显。现生亚洲象仅雄性具象牙，而且象牙通常较纤细；非洲象则雌雄两性均具有象牙，雄性象牙较大而粗壮，雌性象牙较小而纤细。出土象牙从大小比例看，更接近于前者。但因标本保存不佳，故尚难确定其种名”。⁽⁵⁾《西汉南越王墓》的执笔者在《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章的第四节《交通与贸易》中，将“大多发现于广州，贵县、梧州和长沙等地也有部分出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则甚为罕见”的象牙模型，看作“有关南越海上交通的考古资料”。又说：“长沙出现南越式的……象牙模型，表明长沙国贵族受南越贵族影响，经由南越引进……象牙等海外珍品。”⁽⁶⁾这样的判定可能不尽确切。“（象牙）虽然在当时的岭南和西南边境地区也有出产，但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⁷⁾南越王墓西耳室内发现原支大象牙 5 支，成堆迭放。经鉴定，确认为非洲象牙（详见附录一四），这是南越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最有力的物证。⁽⁸⁾认定南越王墓出土“象牙”为“海外珍品”而并非“岭南和西南边境地区”“出产”，应当进行认真的科学鉴定。如果《西汉南越王墓》所说鉴定可靠，可知“南越与海外通商贸易”抵达相当遥远的国度。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通路，说到“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事。⁽⁹⁾《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¹⁰⁾《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¹¹⁾《西汉南越王墓》的执笔者认为“大多发现于广州，贵县、梧州和长沙等地也有部分出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则甚为罕见”的“犀角模型”，也是“有关南越海上交通的考古资料”，又说：“经研究，犀牛产自东南

亚、印度和非洲”，甚至认为：“《汉书·南粤列传》记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方物中有‘犀角十’，估计也是从海路输入而转送朝廷的”。⁽²⁾这些认识，似乎和王莽时代向黄支王索取“生犀牛”的记载相合。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利用考古资料提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行的实物证据，说明当时海路贸易的繁盛景象。⁽³⁾斯里兰卡 DelivalaStupa 遗址出土的一件中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 2 世纪，可以看作这条丝绸贸易通路的早期文物实证。⁽⁴⁾而出土钱币包括“汉代的半两”所提示的信息，有同样重要的意义。⁽⁵⁾美术考古方向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有推进意义的研究成果，有常或《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⁶⁾孙长初《汉画像石麒麟图像考略》⁽⁷⁾等。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 1979 年以后曾经多次出访，从事学术活动，陆续考察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大学以及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为了向国内介绍这些文物，李学勤与友人合作编有《英国所藏甲骨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等图录，同时撰写了许多研究流藏海外以及港台文物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收入《四海寻珍》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列为“新清华文丛”之四出版。《四海寻珍》除了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研究有所介绍外，还说到古来因正常的文化交往而导致中国物品流出中土，后来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成为历史文物的情形。1923 年日本冲绳那霸市外城岳发掘出土，后来归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资料室的战国货币磬折式明刀，就属于这种情形。这些文物见证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正如李学勤所说：“这说明古代自辽东向南应有一条交通路线，以航运与冲绳相连。”李学勤还写道：“在东邻日本，曾出土不少汉以下的铜镜，成为中日人民文化交流的标志。至于‘汉式镜’，在日本的发现更是多得不可胜计。”他介绍了西伯利亚出土的两面汉镜，应为“西汉晚期或略迟一些的时期铸造的”。李学勤还指出：“汉镜向北方和西方流传，此外还有不少例证，但谈到发现年代之早，就应该推上面谈到的这两件了。这对研究汉代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参考意义。”⁽⁸⁾

通过对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相关论著的浏览，能够了解新的研究成果，感受新的学术气氛，学习新的考察方法，每一位关注秦汉史研究动态的人都会因此而欣慰。但是仍然有必要指出，在数量众多的这一方向的研究论著中，依然存在选题陈旧、思路狭隘等问题。重复性研究仍未能避免。不仅有今人和前人的重复，也有个别研究者自己所发表成果的重复。这些问题，有待于学界共同努力予以纠正。例如 1997 年至 1998 年，久玉林除发表《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文化的双向融合》外，又有《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面世。⁽⁹⁾主题的雷同和重复，都是明显的。

注释：

1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 3316 页，第 3318 页。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第 101 页至第 120 页，第 226 页至第 255 页。

3 瞿兑之：《秦汉史纂》，鼎文书店 1979 年 2 月版，第 165 页至第 166 页，第 168 页至第 173 页，第 233 页至第 235 页，第 271 页至第 275 页。

4 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12 月版，第 105 页至第 132 页，第 279 页至第 291 页，第 871 页至第 874 页。

5 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204 页至第 215 页。今按：“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与“同中亚各地的关系”并说，存在逻辑问题。忽略了“中亚各地”也属于“亚洲”的事实。

6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上册第 424 页至第 443 页，下册第 257 页至第 267 页，第 533 页至第 537 页。

7 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第 169 页至第 189 页，第 325 页至第 346 页。

-
- 8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版,第 135 页至第 164 页,第 402 页至第 418 页,第 556 页至第 564 页。
- 9 韩复智、叶达雄、邵台新、陈文豪编著:《秦汉史》,里仁书店 2007 年 1 月版,第 447 页至第 461 页。
- 10 劳干:《秦汉史》,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 1980 年 4 月版,第 71 页。
- 11 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史学月刊》1997 年 6 期。
- 12 原注:Otto Maenchen-Helfen, A Chinese Bronze with Central-Asiatic Motives, BMFEA, No. 30.
- 13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版,第 146 页,第 6 页,第 8 页,第 294 页。
- 14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版;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版。
- 15 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11 月版。
- 16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
- 17 赵梅春:《王符的治边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 2 期。
- 18 曹旭东:《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 年 2 辑。
- 19 李炳泉:《两汉农都尉的设置数额及其隶属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 2 期。
- 20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版。
- 21 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 年 3 期。
- 22 汪受宽:《秦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西部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 3 期。
- 23 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 11 期。
- 24 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宁夏社会科学》2002 年 6 期;王勇:《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农业开发》,《中国农史》2002 年 3 期。
- 25 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3 月版。
- 26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30 页至第 84 页。
- 27 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 年 3 期。
- 28 周永卫:《蜀商·汉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历史教学问题》2011 年 2 期。

-
- 29 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1期。
- 30 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0页至第11页，第20页。
- 31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食货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4月版。
- 32 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 33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郭文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版。
- 34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
- 35 张安福：《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5月版。
- 36 张合荣：《夜郎寻踪——战国秦汉时期的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 37 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版。
- 38 谢崇安：《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 39 周永卫、邓珍、万智欣、温淑平：《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 41 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 42 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1期。
- 43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
- 44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中国史研究》2002年1期。
- 45 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4年1期。
- 46 张志坤：《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辨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3期。
- 47 郝树声：《浅论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4期。
- 48 李虎：《班彪述评》，《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5期。
- 49 孟祥才：《论班彪》，《东岳论丛》2006年1期。
- 50 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1期。

-
- 51 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西域研究》1998年2期。
- 52 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光明日报》2000年12月8日。
- 53 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天水师专学报》2000年1期。
- 54 侯甬坚：《西汉政府的西北边疆开发中的投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2辑。
- 55 何诗海：《汉代屯田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4期。
- 56 徐志斌：《略论若羌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敦煌学辑刊》1999年1期。
- 57 如陈世良：《龟兹都城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2期；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龟兹艺术研究》，1994年7月版；新疆县委外宣办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徐兆寿、闫倩：《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 58 王子今：《焉耆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唐都学刊》2018年1期；《郭钦“剽胡子”“剽胡子”辨——汉代丝绸之路史与西域民族关系史一个断面的考察》，《丝路文明》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版。
- 59 周松：《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1期。
- 60 王子今：《“隔绝羌胡”与“通货羌胡”：丝绸之路河西段的民族关系》，《西域研究》2019年1期。
- 61 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
- 62 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西北史地》1999年1期。
- 63 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1期。
- 64 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期。
- 65 李焕青、刘奉文、王彦辉：《2005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11期。
- 66 高凯、张丽霞、高翔：《略论汉代边关文明的代价》，《学术研究》2009年10期。
- 67 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西域研究》2004年3期。
- 68 刘萧元：《试论解忧》，《西域研究》1994年1期。
- 69 姚景洲：《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东南文化》2000年3期。
- 70 葛亮：《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71 黎虎:《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江汉论坛》2011年1期;《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西域研究》2011年1期;《“质侍”——汉代交聘方式之一》,《文史》2011年3期;《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2期。

72 王绍东:《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文明与野蛮”之辨——从昭君形象的悲剧化色彩说起》,《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0期。

73 王子今:《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74 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75 廖伯源:《使者与官职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天津出版社2006年8月版。

76 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9期;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6期;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1期;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2期;予征:《长罗侯常惠屯田赤谷》,《兵团建设》2008年3期;裴永亮:《悬泉汉简中的长罗侯经略西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期。

77 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西域研究》2011年2期。

78 陈金生:《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2011年1期。

79 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3期。

80 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期;《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历史教学》2016年4期;《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汉匈关系》,《文史知识》2017年12期。

81 郝树声:《汉初的河西匈奴》,《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6期。

82 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8期。

83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924页。

84 马千希:《汉代“五船道”考略》,《西域研究》1999年2期。

85 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1期。

86 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5期。

87 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汉朝的曲折关系》,《西域研究》2005年2期。

88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5年4期。

-
- 89 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4期。
- 90 马智全：《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3期。
- 91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版。
- 92 李伟、晋文：《2009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11期。
- 93 郇文玲：《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历史研究》2007年2期。
- 94 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2期。
- 95 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 96 李卫星：《论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考古与文物》1995年3期。
- 97 李智君：《汉晋河西地缘经济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学术月刊》2008年12期。
- 98 孙少华：《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齐鲁学刊》2009年5期。
- 99 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2期；王子今：《昆仑神话与西王母崇拜》，《学习时报》2002年5月6日；黄光琦：《两汉时代神灵信仰世界中的西王母》，《文博》2009年5期；韩高年：《〈山海经〉西王母之神相、族属及其他》，《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2期。
- 100 周新：《论鄂城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南都学坛》2018年1期；王绍东：《从“闻匈奴中乐”看秦汉时期游牧文化的人文精神》，《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4期；侯宗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及社会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1期。
- 101 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文博》2009年2期。
- 102 辛德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文史》2012年2期。
- 103 胡文辉：《〈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问题再议》，《中国文化》第40辑。
- 104 《汉书》，第1670页至第1671页。
- 105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7期；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7期；阎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文物》1981年7期。
- 106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楚王英》：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诏令“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428页。又《后汉书》卷七三《陶谦传》：陶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费以

巨万”，第2368页。《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传》：陶谦使笮融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第1185页。

107 程存洁：《东汉末年岭南佛教史迹小考》，《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2期。

108 吴廷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2期。

109 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110 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3期。

111 臧知非：《“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人文杂志》2008年4期。

112 傅纯英：《评马援南征》，《史学月刊》1994年2期。

113 祝总斌：《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

114 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5期；又《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国民间形象》，《形象史学研究》(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版。

115 王子今：《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文史哲》2012年1期。

116 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17 杨共乐：《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

118 张伟、卜宪群：《1996年国内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7期。

119 王子今：《海西幻人来路考》，《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20 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121 高大伦：《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

122 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1期。

123 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1期。

124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1期。

125 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3期。

-
- 126 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历史研究》1999年1期。
- 127 徐青莲:《汉代蜀布之形制与交通路线——汉代布帛研究举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
- 128 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四川文物》2014年5期。
- 129 陈征平:《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商品经济与货币形态发展》,《学术探索》2005年3期。
- 130 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9期。
- 131 杨勇:《可乐文化因素在中南半岛的发现及初步认识》,《考古》2013年9期。
- 132 石硕:《汉代西南夷中“僇”之族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民族研究》2005年6期。
- 133 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
- 134 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成都出版社1990年8月版。
- 135 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 136 周永卫:《匈奴与南越关系考》,《史学月刊》2005年3期。
- 137 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王子今:《说敦煌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简帛》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版;《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稷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考察》,《四川文物》2017年3期;《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版。
- 138(斯里兰卡)查迪玛·博嘎哈瓦塔,柯莎莉·卡库兰达拉:《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钱币概况》,《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6期。
- 139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版。
- 140 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考古与文物》1997年5期。
- 141 王颀:《徐福东渡新考》,《复旦学报》1995年2期。
- 142 赵越云、郭风平、李文丽:《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业移民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农业考古》2013年4期。
- 143 王子今:《略论秦汉时期朝鲜“亡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1期;《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
- 144 王子今:《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
- 145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 7 期；《汉武帝时代的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 年 4 期。
- 146 王子今：《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文史哲》2012 年 1 期。
- 147 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 3 期。
- 148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 年 1 期。
- 149 王海：《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南都学坛》2013 年 1 期；《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 5 期。
- 150 孙德华、姜维公：《秦汉魏晋时期吉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简论——以经济基础为观察视角》，《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 5 期。
- 151 苏卫国、张旗：《有关东汉辽东属国问题的一些看法》，《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 5 期。
- 152 赵红梅：《“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 3 期。
- 153 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 7 期。
- 154 程尼娜：《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及其朝贡活动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 2 期；《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求是学刊》2014 年 4 期。
- 155 李路、李德山：《汉代东北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探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 3 期。
- 156 王子今：《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渤海大学学报》2014 年 2 期。
- 157 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 158 梁作楹：《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
- 159 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考古》1997 年 4 期。
- 160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人文杂志》2003 年 6 期；《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 1 期。
- 161 陈曦：《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 2 期。
- 162 索德浩、刘雨茂：《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 M23 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考古与文物》2011 年 5 期。
- 163 王将克、黄杰玲、吕烈丹：《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又《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 467 页。

-
- 164 《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 345 页。
- 165 原注：“《广州汉墓》，476 页。”
- 166 《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 346 页。
- 167 《汉书》，第 1671 页。
- 168 颜师古注：“应劭曰：‘黄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师三万里。’师古曰：‘犀状如水牛，头似猪而四足类象，黑色，一角当额前，鼻上又有小角’”。第 352 页。
- 169 《后汉书》，第 2836 页。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东致海外，南怀黄支，……”“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第 4077 页。《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王奇等人为王莽登基造作舆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中有“受瑞于黄支”语，颜师古注引孟康曰：“献生犀。”是黄支“生犀牛”入献，被看作“德祥之符瑞”，第 4112 页。
- 170 《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 345 页。
- 171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版。
- 172 (斯里兰卡)查迪玛·博嘎哈瓦塔：《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中斯贸易关系》，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 173 (斯里兰卡)查迪玛·博嘎哈瓦塔，柯莎莉·卡库兰达拉：《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钱币概况》，《百色学院学报》2016 年 6 期。
- 174 常彧：《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国学研究》第 2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版。
- 175 孙长初：《汉画像石麒麟图像考略》，《东南文化》2011 年 5 期。
- 176 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第 29 页，第 288 页至第 293 页。
- 177 久玉林：《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文化的双向融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 6 期；《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民族论坛》(长沙) 1997 年 4 期；《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复旦学报》1998 年 2 期；《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西北史地》1998 年 3 期。